

分析探讨

# 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与应对： 基于欧洲多国的调查<sup>\*</sup>

文 峰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关键词] 欧洲; 右翼; 民粹主义; 族群关系; 认知; 应对

[摘要] 论文基于华侨华人“本体”的视角, 分析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移民特征、影响以及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应对特征及相关性。研究显示,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华侨华人生存与发展环境带来多层次、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和应对倾向在个体和结构层面存在着多样性与差异性特征。华侨华人自身、住在国和祖(籍)国各界, 不仅要提高对右翼民粹主义及其影响的认知与理解, 同时在文化认同、经济竞争、制度结构、舆论宣传等方面要有所改观, 以进一步消解右翼民粹主义的负面影响, 推动和谐族群关系与健康社会环境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34.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19)02-0022-10

## Overseas Chinese Awareness and Response to the Right-wing Populism: A Survey of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WEN Feng

(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Key words:** Europe; right-wing populism; race relations; cognition; response

**Abstract:** The resurgence of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has led to a multi-level and multi-faceted impact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author's fieldwork, this paper from an overseas Chinese perspective argues that overseas Chinese awareness of and response to right-wing populism is diverse. It is important for overseas Chinese themselves, their host societies and home countrie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right-wing populism and its impact. All stakeholders should also collaborate to adjust their strategies in dealing with issues concerning cultural identity, economic competition, public opinion, social cohesion, etc.,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right-wing populism and to achieve harmonious race relations and social well-being.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 还不同程度地抑制了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等右翼势力的抬头。但近年来, 随着西方政治危机、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文

[收稿日期] 2018-11-26; [修回日期] 2019-02-27

[作者简介] 文峰(1974—), 男, 博士,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华侨华人。

\* 本文系中国侨联课题“欧洲民粹主义回潮对华侨华人的影响及其应对研究”(项目号: 17BZQK205)、2019年广州社科课题“建国70年华侨华人与广州发展”(项目号: 2019GZYB23)和教育基地重大项目“侨务工作在我国新型外交战略中的作用和地位”(项目号: 16JJD810007)之阶段性成果。

化冲突等问题的加剧，欧洲各国多元文化主义已不再自信。由此，那些自诩代表“人民”的民粹主义者开始重新唤醒“沉默的大多数”，并不断抢占世界新闻头条。有学者强调，“人们需要改变对民粹主义观念的认识。民粹主义不是异常，其话语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主流。”<sup>[1]</sup> 2018年6月意大利新政府的上台更是成为欧洲极右翼民粹之火的最新“爆发点”和欧洲政治之变的一个缩影。

右翼民粹主义以反移民、反全球化、反多元文化主义为核心宗旨，其快速崛起带来的影响也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穆迪认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将对国家移民政策、族群问题治理等方面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sup>[2]</sup> 而欧洲移民的超多样性已经引发一系列反应，整个欧洲都掀起了一股抵制移民的浪潮。<sup>[3]</sup> 这种社会生态的嬗变给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移民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带来深刻影响。<sup>[4]</sup> 国内多位学者也注意到，当前欧洲族群关系紧张的原因在于，欧洲社会与移民在个人利益诉求与族群利益诉求上存在分歧。民粹主义的排外性、破坏性、反市场化等特点对华侨华人及中国海外利益，移民政策与族群关系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族群之间需要建立灵活的冲突解决机制。<sup>[5]</sup> 总之，国内外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相当丰富，多数关注在安全、经济、文化方面对移民的影响和本土居民的态度反应，<sup>[6]</sup> 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穆斯林移民群体，对华侨华人群体的影响研究较少。此外，相关研究多以“第三者”或民粹主义者立场推导右翼民粹主义可能带来的影响，<sup>[7]</sup> 而较少从移民自身的视角去审视。本文以华侨华人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来了解分析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及其应对，并为更好地构建和谐族群关系提出对策建议。

## 一、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移民特征及其影响

### （一）反移民：右翼民粹主义的最显著特征

民粹主义虽有百年历史，但由于其根据情境条件表现不同，所以至今没有完整定义。多数学者认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或政治语言，其包含的成分非常复杂，既是一种政治心态、一种政治思潮，也是一种运动，同时，还是一种沟通方式、政治策略或动员工具。<sup>[8]</sup> 当前，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纲领和宣传中，主要存在两大核心主题——外来移民问题和代议制民主制度问题。而对这两大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则取决于构成其意识形态的四大核心内容——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新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sup>[9]</sup> 极端民族主义通过明确界定一个具有强烈“我们”意识的共同体来树立并不断强化“自我”认知，以排斥被塑造而成的“他者”。<sup>[10]</sup> 排外主义源于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对未来的担忧和自保本能三者的结合，<sup>[11]</sup> 其本质是限制或阻止那些在民族、宗教和文化等方面与自己不同的移民群体入境定居，避免加剧在政治权力、土地资源和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竞争，并保护本民族在语言、宗教、文化和血统等方面的同质性。<sup>[12]</sup> 新种族主义则是对文化相对论价值的翻转，它强调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坚持认为不同文化天然是敌对的，它们相互破坏，进而力求把排斥外国人或陌生人合法化。<sup>[13]</sup> 民粹主义强调，人民的意愿高于任何其他标准，人民居于“中心地位”。而中心地区是指那些道德高尚、团结一致的人们，并被作为一个排斥异己的依据。<sup>[14]</sup> 民粹主义者所构建的“人民”不是泛指全体人民，而是有严格限制的团体，移民、腐败的精英集团等被明确排斥在外，并被视为政治上的敌人。<sup>[15]</sup>

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四大核心内容共筑了其反移民的理论基础。同时，他们还将移民问题归咎于精英政治体制，认为是腐败的代议民主制和精英主义，以及他们推行的一体化、全球化导致了移民的泛滥。因此，在反移民的基础上，右翼民粹主义也反对现行代议制政治体制，推崇直接民主；反对欧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

### （二）多层次、多维度、多形式：右翼民粹主义对移民的影响

右翼民粹主义在建构了思想基础和政治纲领后，便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层面影响社会政治和移民政策。从经验上看，其对移民的影响结果一般有两个层面：一是社会体系，即限制移民的进入；

二是权利和特权体系，即限制移民的权利。<sup>[16]</sup>这也就是当前欧洲所实施的身份收缩政策所体现出来的加强对境内少数群体的社会福利控制和强化对边界的控制。它不仅要求新移民在来到入籍国之前就已经“被融入”，还要求那些已经被完全同化了的长期移民做出更大的融入努力。<sup>[17]</sup>其影响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并且形式多样。<sup>[18]</sup>其中，政治方面主要包括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家通过政党参选、政治联盟、参加联合政府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政府移民政策右倾；经济方面主要指反对欧盟一体化，对外国人就业及外国资本设立各种限制，打压移民经济，削减移民福利；社会方面则是指利用社会排外情绪和排外行为，夸大移民威胁，扭曲移民形象，甚至诉诸族群冲突；文化方面主要指限制移民族群文化发展，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提高移民入籍的文化门槛。

歧视和排斥是支配群体伤害或消解威胁自己权力和利益地位的外群体的一种手段。当偏见和歧视结合，就会被作为权力资源，以保护和增进支配群体的利益。<sup>[19]</sup>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和排斥可能是被社会期待和接受的，并且被合法化，进而“理所当然地”或习惯性地拒绝给予特定群体成员各种平等生活机会。作为一个已有 100 多年历史的移民群体，欧洲华侨华人长期以来艰苦创业，拼搏奋斗，在自身实力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为当地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时局变迁，社会政治生态的右倾也对其生存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从近年来层出不穷曝出的各类人身财产侵害、华商经济遭打压、族群形象被抹黑等事件来看，其中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因此，相关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

## 二、调研设计与样本特征

### （一）调研设计

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态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公众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与态度也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包括个体层面和结构层面。个体层面指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就业状况、政治倾向等；结构层面包括移民规模、经济发展状况等要素。<sup>[20]</sup>移民群体作为社会公众的一部分，既可能是右翼民粹主义所影响的客体，也可能成为支持其行为的主体。因此，这一结构模式对于理解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仍然适用。

调研旨在结合右翼民粹主义相关理论，从个体层面和结构层面右翼民粹主义对认知作一真实了解，梳理其相关特征和存在问题，进而得出相关结论和建议。内容设计上基于华侨华人的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留时间、融入程度、政治倾向等，主要包括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政策主张和政治策略、政治实践和社会影响，以及华侨华人的相关应对倾向等方面。调研方法上，由于样本量大，分布地域广，笔者一方面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重点区域开展实地调研，通过半结构访谈法了解右翼民粹主义相关情况，针对相关问题展开粗线条访谈，灵活交流，以利于分享更多观点感受；另一方面，充分借助互联网平台和华侨华人中的人脉关系，以微信、QQ、邮件等方式，采取非概率抽样中的立意抽样、配额抽样和介绍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家的华侨华人群体中发放问卷，力争客观和具有代表性。

### （二）样本特征

目前，欧洲约有华侨华人近 300 万，其中，英国（约 70 万）、法国（约 60 万）、意大利（约 35 万）、西班牙（约 20 万）、荷兰（约 16 万）、德国（约 16 万），<sup>[21]</sup>这六个国家移民比例较高，右翼民粹主义反弹相对比较明显，故本次问卷调研范围选择以上六国。问卷发放采取点面结合、重点突破的方式，得到意大利欧洲侨报、西班牙新起点中文学校，英国牛津华人中心等机构，以及巴黎、柏林、伦敦、米兰、罗马、鹿特丹等多位华侨华人朋友的大力支持。2018 年 7 月—10 月分阶段回收，共计获得有效问卷 896 份。

表 1 问卷样本主要特征

年龄段	人数 (占比)	文化程度	人数 (占比)	居留时间	人数 (占比)
20~30 岁	176 (20%)	初中	272 (30%)	5 年以下	136 (15%)
30~40 岁	288 (32%)	高中	264 (30%)	5~10 年	172 (19%)
40~50 岁	252 (28%)	大学	252 (28%)	10~20 年	344 (39%)
50 岁以上	180 (20%)	研究生	108 (12%)	20 年以上	244 (27%)

样本总体上看,意大利(305人)、西班牙(186人)、法国(154人)、英国(146人)取样较多,占85%以上;男(440人)女(456人)比例基本均衡;各年龄段比例也比较均衡,30~40岁受访者略多;文化程度上,高中及以下稍多,占60%左右;居留时间方面,5年以上占主体,达85%以上,基本反映了欧洲华侨华人的群体特征。此外,数据还显示,多数受访者社会融入程度不高,与当地社会交往不多。被问及“您有当地朋友吗?”时,68.5%的人回答“没有或很少”;被问及“您参加当地社区(文化或慈善)活动吗?”,只有44%的人回答“偶尔参与或经常参与”;受访者获得政治信息的渠道比较多,其中电视、互联网、社交平台以及朋友间互传都比较重要,但总体政治意识不强,政治参与度不高,表示对政治“不关心、不参与”的占38.23%，“非常关心、感兴趣”的只有9.5%，其余都处于观望状态。

### 三、多样性与差异性：受访者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与应对特征及相关性分析

尽管民粹主义至今没有完整的定义,但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公众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一般主要包括政治思想和组织形式、政策主张与政治策略、政治实践与社会影响等几方面内容。同时,华侨华人的认知与应对还受个体和结构层面各因素的相关性影响。基于此,本文拟从认知内容的纵向维度和影响要素的横向维度对受访者的认知特征进行综合分析。

#### (一) 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思想和组织形式的认知与个体相关性影响

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的内在灵魂和行动原则。但民粹主义有“变色龙”特征,在表现形式上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多变,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都有所不一。同时,组织形式也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很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并不标榜自己排外,其思想和形式都以普通政党或社会团体的合法形式出现。因此,只有对其有长期深入的了解或政治立场明确的人才可能有清晰的认知。很多华侨华人由于平时忙于生计,政治敏感性和关注度不够。从“您对住在国右翼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了解吗(例如法国国民阵线、荷兰自由党、德国选择党、意大利北方同盟和五星运动党、英国独立党、西班牙长枪党)?”的反馈信息看,54%的受访者回答“不了解”,37%“了解一点”,“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的受访者加起来不足9%。而这种结果在男女之间有一定差异,男性的了解程度(54%)略高于女性(39%)。在年龄方面,尽管“非常了解”的受访者中20~40岁的比例比40岁以上的略高,但20~40岁年龄段“不了解”的受访者比例非常高。总体上,年纪大的受访者比年轻的受访者对右翼民粹主义更加了解一些。同时,了解程度与文化程度呈正相关性,文化层次高的受访者了解程度明显更高,这可能与对政治术语的理解能力有一定关系。而居留时间与受访者的认知程度也呈正比,居留时间越长,对右翼民粹主义的了解越多(见图1)。

#### (二) 对右翼民粹主义政策主张与政治策略的认知及个体相关性分析

相比意识形态而言,政策主张及其策略要显性得多。右翼民粹主义反移民、反体制、反一体化的政治主张是社会严重危机的一种强烈反应,其政策解决方案虽然有时只是理想的空头支票,但依然迎合了众多社会失意者的政治愿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常在竞选活动时借助政治广告,利用文字和视觉宣传来暗示移民的两种基本感知威胁:经济威胁和象征性威胁,这对反移民态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sup>[2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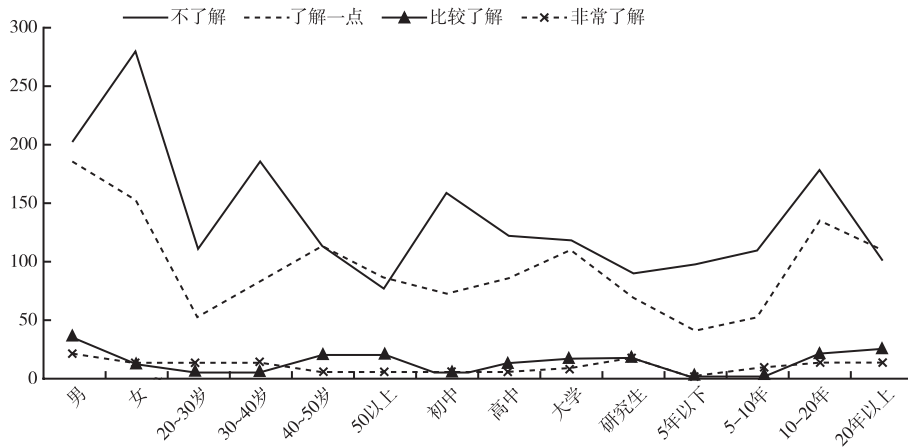


图1 受访者对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和政党的认知及相关性

作为移民群体之一的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政策态度存在一种尴尬的选择困境：一方面不希望反移民政策影响到自己，但另一方面，因为担心新的移民或难民的到来会影响到自己，又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移民政策。在回答“您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策观点（反移民、反欧元、反多元文化主义）持何种立场”时，54%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不赞同，39%的受访者表示部分赞同，表示比较赞同和完全赞同的共占7%。当然，这与华侨华人群体内部的差异性有很大关系。由于不同群体感受到的政策影响不一样，其立场也不一样。这种倾向同样表现在他们对其他外来移民或难民的态度上，62%左右的受访者表示“同情，但不接纳”，其余38%选择“可以接纳”。三分之二以上的受访者明确表示，移民或难民会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只有19%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影响，其余则表示不确定。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相关性影响不大，但居留时间有一定关系：整体上看，居留时间长的受访者认同度更高（见图2）。此外，在对右翼民粹主义反欧洲一体化的看法上，70%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支持欧洲一体化，只有8%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其余22%表示不确定。这与欧洲华侨华人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因为多数华侨华人经商从事贸易、生产加工、餐饮及其他相关服务行业，而这些行业的发展直接受益于欧洲一体化大市场。一旦重回保护主义政策，欧洲华商经济将遭受巨大冲击。

### （三）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实践与社会影响的认知及个体相关性结果

欧洲移民政治的右倾化趋势已成既定事实，这从日趋严厉的移民政策不断出台和此起彼伏的反移民游行即可看出。随着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领导人先后宣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失败，一系列新同化政策和规范化措施不仅给华侨华人经济带来较大冲击，也对华侨华人移民社会支持与文化融入造成深刻影响。<sup>[23]</sup> 这些影响不仅体现在外部的现实层面，也感触于内在的心理层面。当被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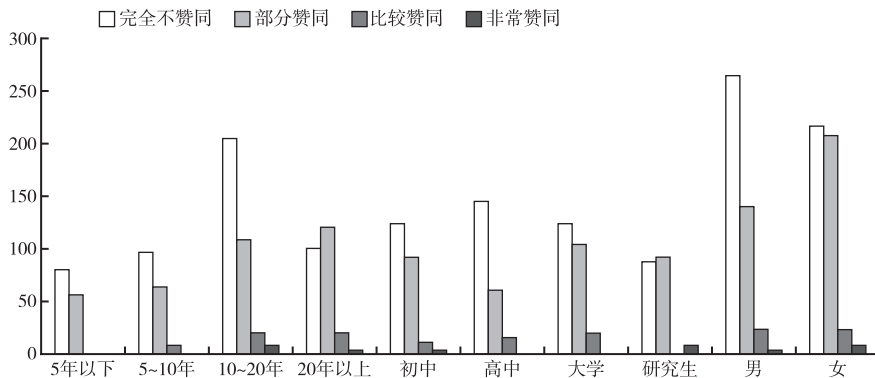


图2 受访者对右翼民粹主义政策的认知及相关性

及“您觉得欧洲当地人近年来的排外情绪有何变化”时，45.5%的受访者认为“增加”，13.5%的受访者认为“减少”，另有41%左右认为没变化或不确定。而对于“与之前相比，现在的欧洲社会生活环境有何变化”，受访者看法不一，46%认为更差，只有9%认为更好，其余的45%认为没太大变化。这种感知与性别和文化层次的关联性不大，却与年龄和居留时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越大的受访者似乎对排外的感知越敏感，而居留时间越久，感觉排外情绪增加的人数也越多（见图3）。

对于政府打击灰色经济的态度，28%的受访者表示支持，12%反对，60%中立。而对“政府削减移民文化社会活动经费”的看法，14%的受访者表示非常理解、支持；62%表示理解，却不支持，24%表示不理解、不支持。而对这种政策实践的认知态度与受访者的性别和年龄的相关性不大，与居留时间有一定关系：居留时间较短的受访者更支持政府的治理政策；而与文化层次的相关性较大：文化层次越高，越支持政府政策（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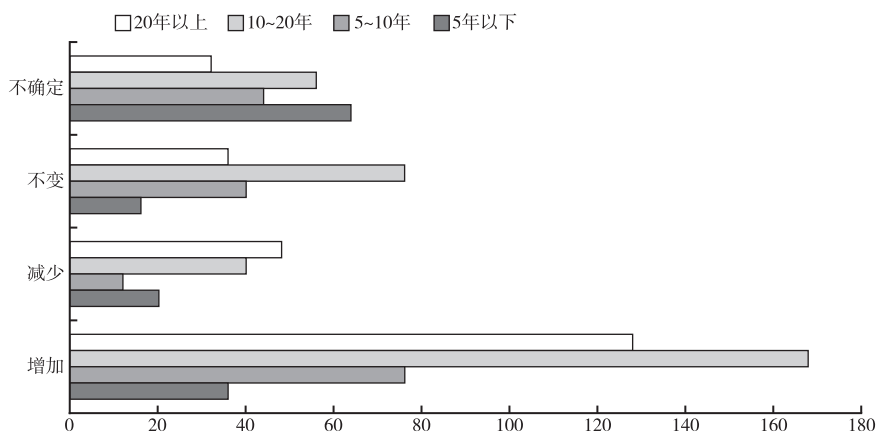


图3 华侨华人居留时间与排外主义感知程度的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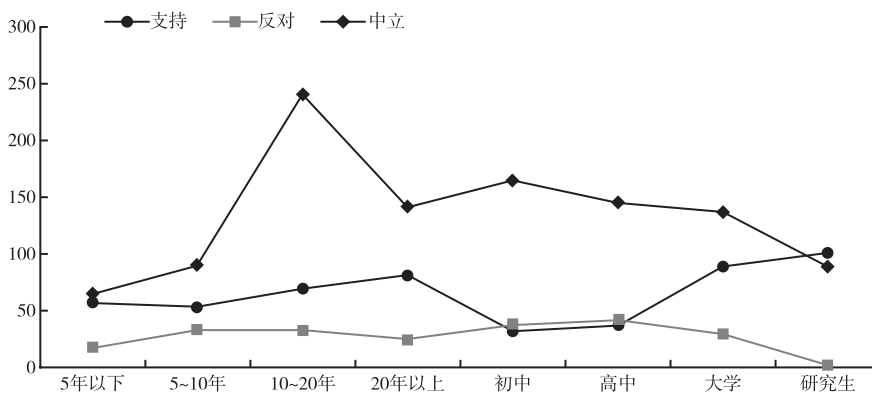


图4 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影响的认知及相关性

这一结果在国别上也存在一定差异，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民粹主义影响较大的国家，华侨华人的感知比英国、荷兰等影响较弱的国家更明显。例如，在意大利，约70%的受访者认为生活环境比以前更差。这与英国智库查塔姆社2016年对欧洲10国民众对其国内穆斯林的不满程度调查有一定相似性。该调查显示，匈牙利、意大利、波兰、西班牙等国反移民程度较高，英国、德国则相对较低。<sup>[24]</sup>

#### （四）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应对选择及个体相关性特征

民粹主义倾向于用其所选择的民众的理想化观点来确定自身，并赋予人民以创造性和依靠性的作用。<sup>[25]</sup>但民粹主义的“人民”排斥那些所谓的“异族”等群体，因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部分华侨华人的生活工作，甚至是核心利益。8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平时工作或生活中遇到过偏见或

歧视。在个人遭遇严重歧视时，33%的受访者倾向于忍受退让，59%选择当面驳斥，17%求助朋友或侨团，21%诉诸法律，另有5%求助使领馆。如果群体层面发生严重歧视，甚至排华、反华事件，32%的受访者倾向于采取协商方式解决，54%倾向于法律方式，19%认为应该游行示威，39%处于不确定、看情况状态，只有1.8%认为要采取暴力方式（见图5）。

在相关性影响方面，受访者在遭遇社会歧视时，应对选择方面与性别关系不大，但与年龄、文化程度和居留时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群体层面，所有年龄段多倾向于协商或法律方式，但个体层面，年轻受访者更多地选择忍受退让、求助朋友或侨团，年纪大的受访者在选择法律手段方面更多一些。文化层次上，学历越高的受访者选择忍受退让、协商方式和法律方式的比例越大，而选择暴力手段的研究生受访者则没有。居留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子，居留时间越短，选择忍受退让和求助朋友、侨团的受访者越多；居留时间越长，选择当面驳斥或采取法律手段的则越多（见图6）。这体现了居留时间越长，越熟悉当地政策环境，并且社会资本积累也越多，更善于维护自身权益。当然，面对民粹主义回潮和移民政治的右倾，部分华侨华人也开始调整反思自身的行为方式，包括规范移民方式、摆脱灰色经营模式、反击媒体舆论抹黑、积极依法维权，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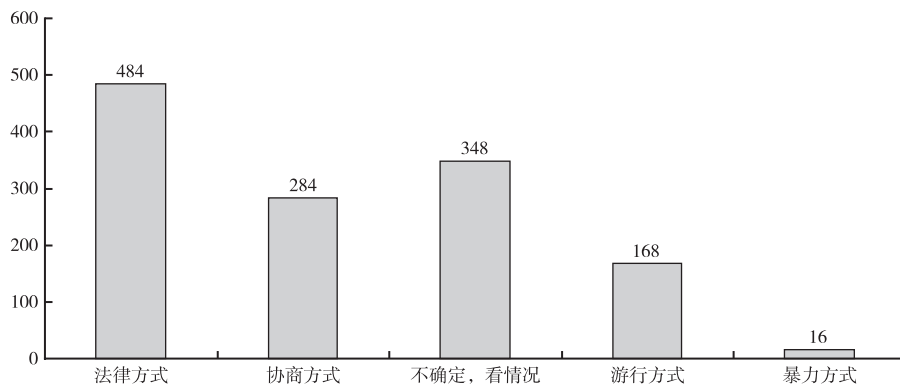


图5 受访者个体遭遇歧视时应对方式选择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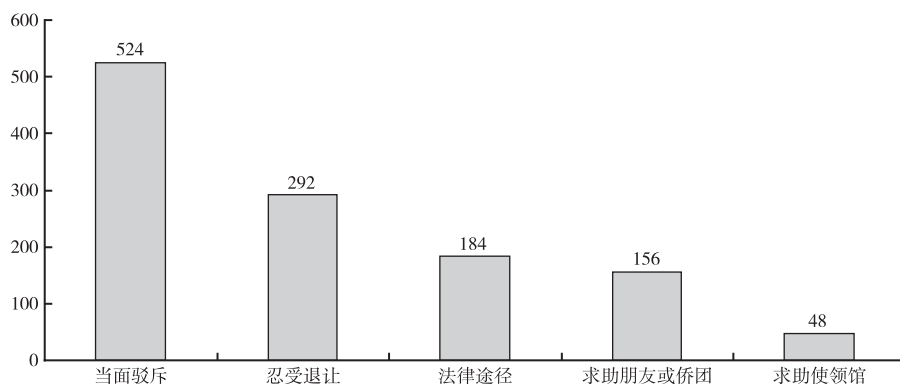


图6 受访者群体遭遇严重歧视时应对方式选择倾向

#### （五）移民规模和经济状况：结构性因素对受访者右翼民粹主义认知的影响

移民规模和经济状况被视为导致竞争威胁的重要结构性指标。<sup>[26]</sup>其逻辑是，群体内部成员认为，外来人口的增长将导致对稀缺资源争夺的加剧，因而主流群体期望通过偏见与歧视来排斥外来移民。研究表明，在移民占比较大的国家，偏见、排外情绪往往更为明显。经济不景气则会引发本地居民对外来移民就业竞争的恐惧，他们往往将经济衰退的根源归咎于移民的增长及其不公平竞争。<sup>[27]</sup>此外，随着移民的规模和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移民不再甘于做二等或三等居民，开始追求更

加平等的社会地位，而这对主流社会的民众而言，就意味着工作机会和社会资源的减少和流失。在经济状况较好时，主流社会尚可宽容，而一旦经济陷入危机，则显得难以接受。<sup>[28]</sup>

今天的欧洲华侨华人群体虽然占比很小，但从20世纪80年代的5万左右增长到目前的近300万，其速度也是惊人的，尤其是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一些城市的华人聚集区，华人占比较大。与此同时，与持续低迷的欧洲经济相比，华商企业却处于增长状态。目前，欧洲华商企业总数超过20万家。随着华人群体规模和经济实力的壮大，欧洲本地人对华人群体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不死的中国人》开篇就深刻描写了一位华人老移民的感知变化：“现在比以前富裕了，那种疯狂和绝望地工作的时期已经彻底过去了。可是过去的日子虽苦，却很幸福。（20世纪）90年代，人们欣赏亚洲人的工作态度，愿意（和他们）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和友情。一栋楼里的邻居还会帮忙照顾小孩，经常送来吃的。今天，有关中国人的新闻里总会有黑社会的影子；在意大利每一个（中国人的）企业里，都能嗅到仿造的气味。15年间，旋律变了音调，在街上没有人打招呼了。一栋楼里的老年人也总是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sup>[29]</sup>

在欧洲人对华人看法有所改变的同时，欧洲华侨华人群体对当地居民和社会的态度也同样在逐渐改变。部分华侨华人开始对欧洲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不仅不认同，甚至有些鄙视。“欧洲人比较懒，就是喜欢享受。”“这些小两厢车不是华人开的，我们要开就开奔驰宝马。”<sup>[30]</sup>少数华侨华人对当地执法检查、媒体负面报道、以及人身财产受侵事件的反应则比以往更加敏感，甚至动辄游行示威，暴力对抗，将事情复杂化。斯蒂芬·斯坦伯格（Stephen·Steinberg）说过，“如果说存在族群问题的铁律，那就是，当各个族群处在权力、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时，冲突不可避免。”<sup>[31]</sup>也就是说，当族群间存在严重的权力和财富不平等时，支配群体可能会通过偏见与歧视等手段和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来达成稳定。然而，最终总会有一个或多个少数群体向这种统治发出挑战，并可能由此引发冲突。<sup>[32]</sup>

从近年来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华侨华人较多的国家发生的越来越多的游行示威，甚至官民冲突事件来看，华侨华人对社会平等权利的诉求和维权意识确实在不断增强。但有时，他们可能在方式方法上认识不够、处理不当，从而导致了不良影响。此外，华侨华人内部不同群体对该问题的看法和反应也不一样。“我们意识到当地社会对华人态度的变化，但比起华人经济问题，这个应该放到更次要的位置。”“近年来西班牙多次查封华商经济，既有政府打击灰色经济的正当性，也不排除其中存在排外主义势力的可能性，但侨胞自身经营不规范必须反省。”“我们不赞同游行示威和暴力对抗，这会使政府和当地社会对华人群体产生不同看法，可能给我们和下一代的生活带来不利影响。”<sup>[33]</sup>从调研看，约46%的受访者还是完全或部分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策的，尤其是一些居留时间较长、融入程度较深的受访者经常看不惯一些新移民的行为做法，认为他们有损华人形象。这也映射出华人社会的内部分化与多元。

#### 四、结语

全球化推动了各国族群多样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虽然公民民族主义预示着多元社会中种族和族群的重要性下降，但族群民族主义仍然可能会卷土重来。<sup>[34]</sup>当前，欧洲族群多样性所带来的严重影响，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势回潮提供了政治与社会土壤。回望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当代欧洲华侨华人社会已今非昔比。其在当地社会和族群结构中地位的提升，加上祖（籍）国综合实力的增强等因素，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华侨华人对当地族群关系的理解与反应。路易·沃斯（Wirth Louis）认为，少数群体由于身体或文化特征区别于社会中的其他人，有时受到有差异且不公平的待遇往往认为自己受到了集体歧视。<sup>[35]</sup>这种敏感度的增加和偶尔的过度反应或许可以诠释近年来不时出现的华侨华人游行示威和维权现象。事实上，人数与社会地位没有绝对的联系，对少数群体的待遇会因时间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势、多数群体的结构特征，以及目标群体的规模、文化和身体特征、被认为构成威胁的程度、周围意识形态和历史环境等等。<sup>[36]</sup>这也进一步印证



了华侨华人对民粹主义回潮的认知与应对,在个体和结构层面等方面表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征。

达比(Darby)指出,社会是一个综合体,不仅有冲突和变迁,也有合作与稳定。在多族群社会中,最可能实现的目标,并不是彻底消除族群冲突,而是如何控制。<sup>[37]</sup>成功的多族群社会治理经验表明,有效控制族群间的紧张关系,首先需要有一个强大并受到尊重的权威政府。但这在今天的欧洲没有真正出现。其次,为了面对偏见与歧视和更好地理解负面的族群信念和行为,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个人品格、不同社会情境的限制和需求,更需要关注多族群社会中群体之间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竞争。<sup>[38]</sup>此外,社会规范比心理预期更重要。族群关系的改善一方面需要通过努力改变态度来推进,另一方面,更需通过改善这些关系的结构来实现。

总之,这些理论经验和认知基础为我们进一步推进华侨华人与当地族群和谐关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遵循。一是要提升华侨华人自身、祖(籍)国和驻外使领馆对右翼民粹主义回潮及其影响的重视度。在增强认知和化解族群冲突时要注意华侨华人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征,针对不同群体要有不同的方式手段,同时重视内部团结。二是要引导华侨华人学会调整和改变。在不放弃自我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学习、融入当地文化,适当改变文化认同。只有主流社会和少数族裔都以宽容的态度尊重对方的文化和族群,才能促进多元文化的持续交融,消解右翼民粹主义的社会根源。<sup>[39]</sup>三是推动华侨华人不仅在经济上为当地做贡献,维护当地社会经济生态,也要努力参与社会治理,积极参政,从制度结构上改善族群关系,抵制民粹主义排外势力的影响。四是加强舆论引导和族群正面形象的宣传,支持华侨华人积极与当地主流媒介合作,增加华侨华人正能量报道,改善当地族群对华侨华人的看法;同时,推动华文媒体创新,扩大其在华侨华人中的影响力和宣教功能,引导华侨华人客观理解当地社会环境变化和族群冲突事件。

#### [ 注释 ]

- [ 1 ]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04 ( 4 ), pp.542-563.
- [ 2 ] Cas Mudde, "The Single-issue Party Thesis: Extreme Right Parties and the Immigration Issu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999 ( 22 ), pp.182-197; Martin A.Schain, "The Extreme-right and Immigration Policymaking: Measuring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06 ( 29 ), pp. 270-289.
- [ 3 ] Ruud Koopmans, et al., *Contested Citizenship, Immigr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Europ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p.12.
- [ 4 ] Andrej Zaslove, "Closing the Door? The Ideology and Impact of Radical Right Populism on Immigration Policy in Austria and Italy",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04 ( 9 ), pp.99-118.
- [ 5 ] 聂平平、葛明:《西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困境与超越》,《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刘益梅:《根治民粹土壤,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兼论排华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新疆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何晓跃:《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特征、成因及影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张莉:《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复兴运动的新趋向》,《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
- [ 6 ] Richard Wike, Bruce Stokes and Katie Simmons, "Europeans Fear Wave, of Refugees Will Mean More Terrorism, Fewer Jobs: Sharp Ideological Divides across EU on Views about Minorities, Divers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https://www.pewglobal.org/2016/07/11/europeans-fear-wave-of-refugees-will-mean-more-terrorism-fewer-jobs/>, 2018年9月25日浏览。
- [ 7 ] Kyung Joon Han, "The Impact of Radical Right-Wing Parties on the Positions of Mainstream Parties Regarding Multiculturalism",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15 ( 38 ), pp.557-576.
- [ 8 ] M. Canovan,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1999 ( 47 ); R.S.Jansen, "Populist Mobilization: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Populism", *Sociological Theory*, 2011 ( 29 ), pp.75-96.
- [ 9 ] 张莉:《西欧民主制度的幽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40-41页。
- [ 10 ] 潘亚玲:《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辨析》,《欧洲研究》2006年第4期。

- [ 11 ] Ioannis D.Evrigenis, *Fear of Enem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92.
- [ 12 ] 梁茂信:《美国的排外主义演变分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 [ 13 ] [ 西 ] 韦雷娜·斯托尔克著,肖孝毛译:《欧洲排外新论调》,《国际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 [ 14 ] [ 25 ] [ 英 ] 保罗·塔格特著,袁旭明译:《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4~131、4页。
- [ 15 ] Edward A. Shils, *The Torment of Secrecy: The Background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Security Politics*, London: Heinemann, 1956, p.98.
- [ 16 ] Edna Bonacich, “A Theory of Ethnic Antagonism: The Split Labor Mar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2 ( 37 ), pp.547-559.
- [ 17 ] [ 法 ] 阿里亚娜·舍贝尔·达波洛尼亚著,钟震宇译:《种族主义的边界:身份认同、族群性与公民权》,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64、65、71页。
- [ 18 ] 于涛:《俄罗斯排外性的根源和当代表现》,《学理论》2013年第9期。
- [ 19 ] Jesse Bernard,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onflict”, *Social Forces*, 1951 ( 19 ), pp.243-251.
- [ 20 ] Anastasia Gorodzeisky and Moshe Semyonov, “Terms of Exclusion: Public Views towards Admission and Allocation of Rights to Immigrants in European Countri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09 ( 32 ), pp.401-423.
- [ 21 ] 根据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2013、2014、2016等历年出版的《世界侨情报告》数据整理所得。
- [ 22 ] G. Lucassen and M. Lubbers, “Who Fears what? Explaining Far-right-wing Preference in Europe by Distinguishing Perceived Cultural and Economic Ethnic Threat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2 ( 45 ), pp.547-574.
- [ 23 ] 文峰:《海外华人社区空巢老人的社会支持体系——以英国牛津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
- [ 24 ] “What Do Europeans Think about Muslim Immigration?”,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what-do-europeans-think-about-muslim-immigration>, 2018年9月26日浏览。
- [ 26 ] Peer Scheepers, Merove Gijssberts, and Marcel Coenders, “Ethnic Exclusionism in European Countries: Public Oppositions to Civil Rights for Legal Migrants as a Response to Perceived Threat”,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2 ( 18 ), pp.17-34.
- [ 27 ] Moshe Semyonov, Rebeca Raijman and Anastasia Gorodzeisky, “The Rise of Anti-foreigner Sentiment in European Societies, 1988-200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6 ( 71 ), pp.42-49.
- [ 28 ] [ 39 ] 聂平平、葛明:《西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困境与超越》,《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 [ 29 ] [ 意 ] 拉菲尔·欧利阿尼、李卡多·斯达亚诺著,邓京红译:《不死的中国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 [ 30 ] 根据笔者2014年6月在法国,2017年5月在意大利、西班牙调研期间访谈多位侨胞整理所得。
- [ 31 ] Stephen Steinberg, *The Ethnic Myth: Race, Ethnicity and Class in America*, Updated and expanded ed. New York: Atheneum, 1989, p.170.
- [ 32 ] [ 36 ] [ 38 ] [ 美 ] 马丁·N.麦格著,祖力亚提·司马义译:《族群社会学》(第6版),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83、88、523、83页。
- [ 33 ] 根据笔者2017年5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华商大会和在西班牙马德里访谈华商D先生、L先生和华二代Z先生所得。
- [ 34 ] Andera Voyer, “Disciplined to Diversity: Learning the Language of Multiculturalis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11 ( 34 ), pp.1874-1893.
- [ 35 ] Wirth Louis, “The Problem of Minority Groups”, in Ralph Linton ( ed. ), *The Science of Man in the World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p.37.
- [ 37 ] John Darby, *Northern Ireland: Managing Difference*, 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1995, p.29.

[ 责任编辑:张焕萍 ]